

努力推进陕西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蒋惠莉

文学作为标识一个民族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精神高度的神圣事业，注定是一场永无终止的创新接力赛。文学陕军虽然是陕西文化、中国文化一张靓丽名片，但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如火如荼的冲击，面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多样需求，陕西文学和中国当下很多省份的文学一样，面临着全新的时代课题，那就是如何薪火相传，回应时代，“再出发”，“快出发”。应该说，此次研讨会是文学陕军再出发、快出发的加油站。我们将认真学习、探讨各位专家学者的指点和批评，在下一步工作中，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做好联络、协调、服务工作，高度重视作家队伍建设，努力推进陕西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一是大力倡导创新，大力推出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学作品，积极实施文学精品战略，以优秀的原创作品为“走出去”打牢基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创新作家深入生活的形式，鼓励作家潜心生活体验和艺术探

索，不断推出能在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精品力作。持续推进“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原创作品”出版及推荐活动。要特别关注中青年作家原创作品的高档次出版和高规格研讨。要积极开展交流渠道，加强跨省域的、全国性的和世界性的文学合作交流活动，深化陕西文学海外翻译推介计划的执行力度，让陕西原创文学作品既能“出得来”，又能“出得去”，同时也能走得远。

二是创新机制，创新形式，不断推进“文学陕军”人才队伍建设，建强军，打硬仗，出力作。要继续发扬陕西作家深入生活的优良传统，制定《陕西省作协作家挂职锻炼及深入生活管理办法》,制定并常态化执行青年作家扶持培养规划;加强陕西作协文学院建设,制定《陕西省作协签约作家管理办法》,建立竞争激励机制,规范和加强签约作家创作指导、服务、管理和考核工作;将与鲁迅文学院合作，定期举办陕西中青年作家班;要完善奖励机制，重奖好作家、好作品;加强优秀文学人才引进工作和落实优厚待遇政策，让优秀作家既能留下来专心创

作，又能有动力冲刺力作。

三是接通评价体系，建立观念、思想激励机制，增强作家与时代的对流，让更多的人了解陕西文学，认识陕西文学。坚持把名家新作和新人佳作研讨批评活动常态化，与陕西省图书馆联合，长年进行“陕西作家有好书”论坛活动，定期举办全省优秀中青年作家主题性创作动态通气会，致力于培养陕西读者对陕西作家和当下文学的感情，唤起作家对时代、对文学的信仰和责任感。要创新手段，加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队伍建设，邀请全国的专家、学者和评论家经常对陕西文学发展现状和发展态势分析研判，有重点地关注创作较为活跃的作家和引起广泛关注的热点作品及文学现象；要加强文学品牌阵地建设，在《延河》《小说评论》开辟“原创进行时”和“陕西中青年作家研究”栏目，建立创作、研究、评论、传播、推介一体化的新型文学生态体系；要加大对《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收获》《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知名大刊的联络，不遗余力地为陕西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走出去”铺路搭桥。

重传承 善养气

□何西来

作为文学陕军应当有两个传承，一是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文明的传承，二是中国近代革命文化的传承。

陕西现在被看作是西部，刚才陕西来的朋友也讲西部，实际上陕西并不处于中国的西部，兰州以东都不是西部，这是从历史地理的概念来说的。关中自古以来是一块号称“天府之国”的地方。中国有作为的朝代、大的朝代，如周秦汉唐，均发源于陕西。我同意大家讲的，“文学陕军”是一支“地方军”，陕西是一个地域文化鲜明的地方，它曾经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艺术中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我觉得陕西本身的这种超越性，决定了我们继承的观念是汉唐雄风。当要承担使命的时候，当这支“军队”要再出发的时候，必须想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在作为“陕军”，应当延续开拓意识，陕西人把自己局限于关中是没有出息的，秦国如果局限于关中是不可能得天下的。秦得天下前后600年，从秦穆公算起，他们的君王埋的墓都是东向的，连兵马俑的战阵都是朝着东方的，朝着太阳的方向，所以我们现在的秦人、现在的作家也要有这样一种文化气度和胸襟。

红色文化的传承同样鲜明。中国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30万人最后打的只剩下1.5万人。毛泽东带领着这支经过长征损失惨重的军队，在陕北休养生息13年，而后得天下，我觉得红色传统延安精神就是一种开拓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政治精神，也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学陕军就应当像延河的水一样流入黄河流入海洋，千年万年永不停息。

浩然之气是一种正气，我们正处于上升期，不管有多少困难，有多少矛盾，有多少问题，但是国家处于上

升期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身处一个正在展开的盛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人民缔造的盛世，我觉得作为文学陕军要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使自己适应这样一个要求。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谁都阻挡不了这个趋势，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当中专心思考的部分，作家也一样，应当比较早地感觉到这一点，为正在复兴的国家民族做一些什么。你的责任在何处，你的岗位在何处，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要有怎么样的胸襟，这不仅是对文学陕军提出出来的一种考验，也是对我们整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提出来一个命题。一个时代，经济发展了，不能只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文化也要跟上去，要培养一支有气度的、为人类作出贡献的文化和文学队伍，所以对我们作家个人来说就是要有气度和胸襟，就是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陕西这块地方，水深土厚，黄土高原肥沃的土壤经过亿万年沉积，已然雄厚，这种深厚同时也是文学的。

关中的知识分子要有出息，必须一面向东，一面向西——走西口。现在国家提出了要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它应当同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经济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经济实际上是文化政治艺术宗教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拓展我们的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应该烙上中华民族的烙印。我对陕西的这些乡亲们，如果说有所期望的话，以上讲的这一点算做对陕军再出发的期望，是陕西籍的一个75岁的老人的一点寄语。

陕西是实学官学的发祥地，中国礼乐文化的发祥地，陕西历来的文化文学都是跟人民群众的疾苦期望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应当实实在在地踏在这块土地上再出发，赢得更大的辉煌，作出更大的贡献。



要重视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

□白 烨

“陕军东征”是发生在1993年的事，已经有20年了，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进入当代文学史。今天看来，当时的5部作品可能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在当时，它们集体呈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长篇现象，这个现象今天回过头去看，有很多意义。它是陕军文学创作实力的一次群体性的展示，也是商业运作和媒体炒作的一种成功范例。本来是5个作家个人的行动，“陕军东征”这个概念一出来之后，把5部作品做了整体曝光，就变成了一种现象，很受人关注。

同时，从1993年开始，长篇小说创作开始崛起。1993年之前，每年的小说刚刚200部，从1993年开始，三百四百五百，一直往上攀升，直到90年代末达到1000部。所以1993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转折的标志就是“陕军东征”，它不仅是陕西文学界的事，更是整个长篇小说的辉煌。但是20年之后，这样的辉煌很难再现，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其实陕西面临的问题跟中国面临的问题是

一样的，这20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90年代是市场对文化的冲击，新时期是网络科技对文学造成极大的冲击，这两次冲击使文学跟过去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文学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是，它不再像那个时候处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它其实是一直在往边缘不断地移动。即便在文学内部，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分化，这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所以，在目前这个环境下，我觉得外力的帮助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的发现力、扶持力、培养力都要比过去再加大才可以，我们要善于发现新人，尽我们的力量，促进新人的成长，包括评论界，包括各级作协，给予年轻作家各种各样的帮助，通过这种综合手段去发现扶持新人。在这方面，北京市作协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推荐了很多新人，现在渐渐地形成签约作家群，团队越来越强，所以作家本身的基数很大，出人才的概率就比较高。现在我们的作协、我们的老一辈文学工作者如何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发现新人方面，我觉得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期待青年作家更出彩

□孟繁华

“文学陕军再出发”显然是一个庄重的仪式，首先向陕西作家表示祝贺。现当代陕西文学创作最重要的部分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柳青在那个时代，他难以逃离文学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但是生活的逻辑同样使他创造出了一部伟大的作品，这个传统我觉得被陕军全面地继承下来了。比如1993年的“陕军东征”，可以说是陕军成就最集中的一个体现，像《白鹿原》《废都》等等这几部作品的出现应该是新时期文学转型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我们一直谈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什么时候真正开始转型？那就是1993年的陕军东征，包括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等等。这些作家带着他们的不同经验和他们不同的书写方式、讲述方式开启了长篇小说另外一个时代。但是此后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陕西作家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家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就是他们更多关注的是陕西的三座大山，也就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三个人，其他的一些作家，比如叶广岑、冯积岐、高建群、莫伸、红柯，如果在其他地区也都会成为文学领军人物。他们都是一线的作家，但是对他们的关注是不够的，这个我觉得跟三座大山的遮蔽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陕军”中的“70后”、“80后”可能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个力量薄弱的问题。按我的理解，50年代、60年代是一个历史共同体，70年代是一个身份共同体，80年代是一个情感共同体，但“70后”、“80后”的陕西作家游离了当下整体文学发展的脉络。我们正在编一个“70后”的文学大系，20位作家的名单里头陕西作家一个都没有，这让我们非常惊讶。现在大家都读韩寒、郭敬明，这是正常的，因为文学有它的时尚性。如果你不读郭敬明、不读《小时代》，在大学里面你可能就找不着谈话伙伴，你就进入不了一个文学圈子和话语圈子里面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我觉得陕西“80后”的作家游离这个群体，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好的，对文学时尚性的远离使他们成为最后剩余的文学力量，很可能在最后的坚守当中是一个主体；另一方面，游离出情感共同体以后，对当下文学的取位和当下青年所关注的问题，同时就会把它排斥掉，我觉得这可能是陕西的“80后”作家没有迅速地走向前线，接续起前辈作家的创作辉煌的原因之一吧。

乡土叙事并未终结

□张 柠

陕西作家的创作是用一生来追踪的，我们只能从很小的地方去切入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处在一个撕裂的状态，一方面市场追捧的文学、流行的文学让文学环境更加复杂，它们总体的特点是向上看，向前看；还有一种写作就是向后看，向下看。我觉得向上看、向前看的写作在追逐新奇的东西方面，在市场的传播效果层面上，确实是非常有力的，但是这些东西我们还无法把它纳入我们的文学教学、文学分析、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来。我们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选修的，或者新的建设性的东西。当我们在课堂上讲授文学的时候，我们还是喜欢那种向后看、向下看的比较厚重的文学作品。“向后看”赋予了文学历史感，“向下看”赋予了文学生长性，所以在陕西作家整个创作里边，我觉得它在向后看和向下看的趋向上有代表性。陕西作家在这方面是一个代表，他们承载着文学自身的记忆功能和生长功能的基础，所以在乡土文学这一块大有作为。

这些年存在一些争论，比如说关于乡土文学终结的话题，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当我们一直在寻找年轻一代写乡土题材之外其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感觉，尽管它很新奇，但是感觉到厚度是不够的，是轻飘的，是经不起细读和分析的，只不过新鲜元素的出现使我们有了猎奇感。所以我觉得乡土文学的特点是在一个当代的完美文化和完美生活的矛盾之中展开的，我们社会化建设上追求完美生活，而我们的历史感，我们土地的那种生长的质感，实际上恰恰呈现一种完美文化。完美文化和完美生活处在一种撕裂状态的时候，才会出现一种叙事的文学，抒情时代的终结向现代文明城市文学转型过程当中诞生了一种叙事性。但是叙事文学会在过于追求当下的完美生活的过程中终结，它会丢失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所以陕西作家的作品读起来隐含着一种非常浓郁的抒情性，它是来自于后面，来自于下面，来自于历史和土地的。同时作家在叙事过程中，几位代表性的作家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处理诗性情怀和人性的知识的过程中，更偏向于诗性情怀，在叙事性的作品里包含着浓郁的叙事文化。我们不能说这种东西是文学惟一要追求的东西，但是即使年轻一代的作家没有能力去写乡土文明的东西，他们也必须要了解、要阅读。如果不阅读、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一块，中国土地的那一块，他写出来的这种仅仅是向上的、玄幻的、穿越的东西，会给读者一种特别轻飘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乡土题材、乡土经验的表述，毫无疑问并没有终结，他是未来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参照体系。所以，陕西作家在向我们展示那么大的大家、大作品的同时，还是不应该让年轻一代离开这样一个土地，离开这样一个非常厚重的创作模式。我觉得陕西年轻一代的作家也应该关注自己乡土的这个特征，而不是盲目的像一线发达的城市，比如上海北京大城市的作家一样去写最时髦的东西，这种时髦的东西不是任何一个地区的作家都能够驾驭的。所以陕西年轻一代作家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地域特色，我很期待看到年轻一代的作家里边出现陈忠实、贾平凹这样的作家。

观点

周 明：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会议。

大家讲到文学陕军要再出发，那必须得有队伍，必须先整合一下这个队伍。陕西文学目前、今后都需要新的力量，使“陕军”能够真正做到继往开来，发展壮大。陕西可以说是小说大省，小说在文学中绝对占优势，特别是长篇小说。那么在诗歌领域，过去是不错的，现在比较弱。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在陕西都比较弱，能不能坚持写，能不能扭转当下的这种文学格局，值得深思。

陕西这几年变化巨大，陕南、陕北秀美山川展现出新的面貌，这是最好的题材，所以这方面希望能把它整合进来，使这支队伍继承陕西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然后再创辉煌。

陈福民：

我想谈一下陕西文学的厚度和敏感。厚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迟钝，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陕西文学的敏感，这一点我想从贾平凹的发言说起，我没有想到他的发言准备得这么认真，而且言之有物，第一点他谈了转型中的中国、中国改革的深水區。第二点，他谈到了中国文学用30年完成了对西方的学习，他有这样一个对世界和中国文学的认知，我觉得这是陕西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再出发一个特别好的起点。

有个说法很有道理：如果方向错了，停下就是进

步，因为你方向错了，再往前走肯定是错的。所以说文学陕军再出发，认知这个世界，认知文学跟社会的关系，知道我们中国改革进了深水區，中国的转型带来了各种新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世界上没有的，就是中国人现代化的经验，所以只有从我们的本土出发、从经验出发去看待自己的文学才会有一个新的可能性。我觉得陕西文学的起点就应该在对时代的认知，对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涌现的各种文化经验的认知上。因为在技术层面，在文学观念层面，我们确实已经完成了向西方文化的学习，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中国文化的经验。

木 弓：

“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很及时。我想，不仅是文学陕军要再出发，其实全国文学都应该再出发。

现在我们的国家与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在适应着世界格局变化的时候，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都被纳入世界历史进程。当今世界，所有的事情不再是一个村子里的事，也不是一个县和一个省的事，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再小的事情都应该放到一个国际格局来思考，文学陕军的再出发也应该放到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走向中，思考中国要对人类文明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文学陕军对中国文学史贡献非常大。它突出的特点是在现实主义方面的贡献，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起，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价值奠定了深厚的基

础。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价值，首先是要在思想上跟进这个时代，反映这个时代；二是在文学人物的塑造上，要富有时代气息。

陕西文学作家非常多，今后陕西文学向何处去，怎么发展，除了传统的以外，还要有新的追求。我最近在谈陕西作家孙皓晖的《大秦帝国》，是作者花了16年时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大概有500万字，很可能意味着至少在历史小说方面陕西的贡献可能会站到全国的前列去了。

据我个人的评价，它很可能是改变中国当代文学思想格局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恰恰是站在中国与世界对话这样一个平台上去思考问题，跟现在的和平主义这种文学基调不一样，非常有个性，人物鲜活，内涵丰富。所以我们大家对陕西的文学要有信心。

何向阳：

1993年文学陕军东征，2013年文学陕军再出发。2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文学陕军中已经有了新一代作家的加入。对于陕西作家的中坚力量，像贾平凹、叶广岑、红柯等，我都有文章专门作了评论。这一次集中阅读了陕西作家中的新人新作，感想颇多。我觉得陕军中的新人创作不仅继承了红色文化，也继承了陕西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在陕西的新一代创作中看到柳青的传统，同时也可以看到陈忠实和贾平凹的传统，我想这个传统的高峰期远未穷尽，它肯定会酝酿新的、更大的文学高度。